



张学良全传

米学继 刘 红 著

作家出版社



张学良 全传 (下)

张学良 著
刘红



不怕死

不受

张学良

张学良手迹

丈夫决不受人情

顶天立地男儿汉

磊落光明度此生

序 言

第一章 军阀之长公子

“双喜”临门	2
立志救国	7
“小丈夫”	11
迈进讲武堂	14

第二章 非凡的“少帅”

最年轻的将领	20
崭露峥嵘	22
直奉大战成名	28
郭松龄反老帅	34
内战中的反思	49
接纳红粉知音	54
日本中途换马	56

第三章 第二代“东北王”

沉着应对危局	66
未完成的营葬	68
继承父亲霸业	71
顶住压力易帜	73
“杨常事件”	84
东北新建设	95
中东路事件	105

第四章 一人之下的副司令

时局中的中心人物	124
----------	-----

风光无限的副司令	145
在东北的最后日子	155
“福兮祸所倚”	158

第五章 “不抵抗将军”

“日本人要动手了”	168
“不抵抗”的对策	177
又一个“九一八”	184
“莫须有的公案”	193
究竟谁不抵抗	196

第六章 不抵抗中的抵抗

有限度的抵抗	204
不战而弃锦州	210
撤汤玉麟受阻	217
与汪精卫交恶	222
热河备战空忙碌	230
第一个跳下危船	236

第七章 人生的重大转折

矢志戒断毒瘾	252
漫游欧洲大陆	258

第八章 从反共泥潭超拔

坐镇华中“剿共”	270
合组“四维学会”	279
研究共产党	281
誓言复土雪耻	284
响应新生活运动	288
整顿东北军	293
反思不抵抗	297
西北“剿共”	299

第九章 促成“三位一体”

秘密联系中共	318
两次洛川会谈	321
张周延安会谈	325
“三位一体”形成	332

下

第十章 “逼蒋抗日”

思想组织准备	346
寻求国内外盟友	352
抗日舆论准备	353
艳晚事件	356
从苦谏到哭谏	361

第十一章 “西安捉蒋翻危局”

兵谏部署	380
骊山捉蒋	388
应变措施	393
扣留中的委员长	396
中外的反应	401
化解内战危机	414
中共的和平斡旋	419
宋子文“探路”	425
独自“负荆请罪”	431

第十二章 “西望云天”

审张赦张的把戏	448
关注西北善后	458
少壮派自毁长城	467
东北军被分化	475

第十三章 二十二载囚禁

孔公馆成临时监狱	486
雪窦山“读书”	487
“四省驰车不久留”	500
“夜郎国”八年	508
企盼自由到来	516
正义的呼声	520
劫持去台湾	527
“城门失火”	532

嘉宾远道来访	534
“枕上泪难干”	540
险恶的年代	541
奉命写“反省录”	544
幽禁中的读书思考	549
接受“洗脑”	556
第十四章 三十一载幽居	
迁居台北“朴园”	566
“白首缔盟”	568
几位特殊朋友	571
公开接见记者	576
“此中有真意”	577
第十五章 最后的自由岁月	
争取全面自由	584
庆祝九十大寿	589
接见日本记者	595
赴美探亲访友	598
初尝自由滋味	602
回乡之梦难圆	604
艺术家的问候	616
定居美国檀岛	621
庆祝百岁大寿	628
听从上帝安排	634
黄炎子孙同悼	637
附录一 张氏世系表	649
附录二 张学良生平大事年表	650
附录三 1929年1月东北军序列	662
附录四 日本关东军沿革及编成	666
附录五 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序列	671
附录六 1936年东北军序列	672
附录七 1936年第十七路军序列	674
主要参考文献	675
后 记	

思想组织准备

张学良既决心联共抗日,为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灌输抗日思想,统一意志,加快新式干部的培养,决定与杨虎城联合创办军官训练团。他借口仿效蒋介石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经验,培养“剿共”骨干,报请蒋介石批准,于1936年6月15日在西安东南的长安县王曲镇设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训练团一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前两期的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为黄显声。

第一期是干部连,选择对抗日有正确认识或思想比较进步的校级军官参加,名单由张学良与刘澜波等人审定,其中多数人是从特别人事档案里选择出来的,主要是西北“剿总”总部的处长、科长、参谋、秘书、科员和军队中的师长、正副团长、营长等,共计108人(初选120人,12人请病假或事假未报到),分成12个班。班长大都是上校级军官,担任副班长的大部分是中校级军官,其余为列兵。干部连的连长是王以哲,副连长是缪激流。干部连一个月后毕业,多数留作训练团的干部。

第二期全是部队中的正副团长、营长、连长。第三、第四期兼收十七路军和其他西北部队的军官。

训练团学员所住的地方,是依着土崖挖成的一溜窑洞,宽约一丈五尺,纵深约五丈,每班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学习就坐在这些土桌和土凳上面,不论职务、军衔,大家一律平等。

课程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训练和游击战术等,内容以政治为主,技术为辅,侧重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每天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内容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课余时间,大家用从西安带来的留声机学唱进步歌曲,主要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等。开始,东北军军官不习惯唱歌,劲头不足,张学良鼓励大家唱下去,他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些歌曲都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内全部学会,是比较难的。最好大家都能熟练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这个歌意义明确,曲调慷慨激昂,鼓动性强,较易普及。”有一次,张学良和大家一起唱完歌,愉快地对刘澜波和应德田说:“这些歌对抗日教育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也就大了。”在干部连结业大会上,全连合唱了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效果非常好,既丰富了学员们的生活,又提高了他们的抗日觉悟。¹

张学良对训练团非常重视,亲自驻团,住在离窑洞不远的一座古庙太师

洞,经常给学员讲课,一起讨论,和大家同唱救亡歌曲。他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

有一天,学员们吃过晚饭,坐在窑洞里随便讨论,交流思想,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落西北,蒋介石屈膝投降,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怨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突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学员们纷纷响应,场面既热烈又悲壮。张学良见状,内心也非常激动,站起身,流着泪,说道:“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学员们听后,热烈鼓掌。²

为了统一东北集团的意志,团结东北集团的精神,确立东北集团的中心思想,避免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外界的误会,张学良终于决定把他的抗日决心与态度,坦坦白白地说出来。6月22日,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作了《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长篇演讲,第一次在东北军内公开表明了自己誓死抗日的决心。在讲话中,张学良主要谈了四大问题:

(一)抗日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中国的大地,主权被敌人剥夺殆尽,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更无保障之可言。留在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淫威下,过着非人类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还有什么可怕牺牲的?建设与准备,日本绝不允许我们充分做的!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也谈不到。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中国的组织也无时不在遭敌人的破坏,他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惟有抗日,一致对外,才能求得统一。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后我们对日惟有抗战,决不能再蹈前此覆辙!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

(二)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东北的失掉,固然有复杂的原因在,其责任不能完全由东北军担负,但毕竟东北是日本从我们手里用武力夺去的,所以一定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东北军应该有这种精神:过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不掩饰我们的过错,我们不推诿我们的责任!我们誓死要完成我们的责任!东北军要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东北要抗日,不是不兑现的空话。东北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成功,我们未必亲眼看见;荣誉,对于我们这些负有耻辱的人早已绝缘;至于东北的土

地、主权，那是中华民族的，我们也绝不能有任何非分的妄想！惟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

（三）东北军抗日行动的最低准备。东北军过去只代表地方利益，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逐渐发展为政治集团，但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目前，东北军要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改变封建意识，建立中心思想，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在当前的非常时期，每个人要认清目标，坚定志向，培养正气，追求真理，对事不对人，放弃自己之利益。我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绝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绝无所惜。我说这些话不是表白，也不是夸口，只是表表我的决心，与大家共勉。

（四）抗日最后胜利终会属于中华民族。其原因在于：第一，日本国民立场不同，主张分歧，团结不坚固；第二，日本经济困难，国本不固，没有长期作战的条件；第三，中国不是日本的惟一对手，它还有更大的敌人——苏联；第四，中国是民族自卫战，在地理条件、民族士气上，都占优势。我们如能善于利用地形和游击战术，日本的新式武器不能尽量发挥其效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唤起我们的久已消沉的民气，组织我们一盘散沙似的民众，拥护领袖，集中国力，把全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的阵线去长期抗战，这是历史给我们所决定的重大使命。诸位同志！你们认为我的路对，请你们坚决地随我来！你们发觉我决心动摇，请你们把我打死！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地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才能对得起做了若干年奴隶的东北父老兄弟姐妹！才能对得起死在敌人炸弹下的先大元帅及忠勇的抗日志士们、死难的同胞们！³

这篇讲话，后来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普遍发行，引起广大将士的强烈反响。在讲话中，张学良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拥蒋“剿共”、拥蒋武力统一中国，然后再去抗日的思想，不点名地批评了蒋介石等人鼓吹和坚持的“长期准备论”和“唯武器论”。

武汉时期，张学良经常谈到的是“复土雪耻”、“披甲还乡”，到这时在公开场合明确喊出了“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口号，对东北军部属表达了自己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坚定了只有抗日才能统一的信念，从而完成了从“安内攘外”到“攘外安内”的思想转变。这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最大的政见分歧和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像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吴天威评论的那样：

“可以说,这本小册子里已经播下了西安事变的种子,张氏在(民国)二十五年六月间所想的与所说的,正好是六个月以后他所做的。”⁴

王曲军官训练团为东北军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在此基础上,张学良于1936年7月底开始筹建抗日同志会。他对参谋孙铭九、秘书应德田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组织吸收反蒋抗日最坚决的军政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抗日的核心组织。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张学良当场把一个十六开大小的黑色硬皮本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应德田也相继签名。后来,发展会员都在上面签名,这个小本子也就成了同志会的签名簿。

9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成员有15人。至西安事变爆发时,已发展



张学良手下“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

到70多人,包括刘鼎、刘澜波、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马占山、宋黎、马绍周、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刘桂五、张政枋、吴克仁、赵毅、高福源、唐君尧、吕正操、万毅等人,既有东北军的军、师、旅、团、营长和西北“剿总”的职员,又有不少共产党员。同志会推张学良为主席,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应德田为书记,苗剑秋⁵为理论宣传部长,并由应、孙、苗三人组成一个

小中心,被称为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他们在张学良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联共抗日活动。

张学良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相当重视,发展会员,要经过他

批准。每次新会员入会,他都亲自主持宣誓仪式,并发表讲话。会员入会,先读入会誓词,然后亲笔签名于会员簿上,入会誓词是:

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

此誓

抗日同志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如:对军官的抗日教育,东北救亡的活动,东北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与共产党的联系,接待红军代表,掩护红军往来人员,整顿东北军,选拔抗日人才充实团体,等等。随着抗日同志会的成立,东北军内部形成了所谓“东北少壮派”,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就成为少壮派的核心,他们是张学良的心腹人物,握有很大的权力,对于推动西安事变的发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人年纪轻轻,都不是政治上很成熟的人物,在西安事变后被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正所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刘鼎的建议下,抗日同志会还创办了《文化周刊》,由应德田主编,宣传团结抗日的理论及进步文化与思想,反对剿共,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同志会不断扩大,在各师、团中也逐渐建立了组织,吸收了一批团以下的校官参加,实际上已成为由张学良直接领导的、东北军秘密联共抗日的核心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军联共抗日运动的发展。⁶

不久,张学良为培养新的抗日干部,又接受刘鼎的建议,任命孙铭九由中校随从参谋改任卫队第二营营长,创办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学兵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9月初开始,9月底正式成立,共有队员400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

卫队第二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兵队队部也设在这里,孙铭九兼任队长。队员学习、训练、生活都在城楼上,不个别上街,星期天洗澡都是集体出去,非常守纪律。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虽然约莫知道有这么一支学兵队,但其中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训练的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⁷

学兵队自成立后,进步很快,引起张学良的重视和关怀。11月,绥远抗战爆发,学员决定绝食一天,集资援绥。张学良知道后,批评了孙铭九,并亲自

接见全体学员，称赞大家的爱国之心，要求大家停止绝食。他说：“我一定要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失信。很快，也许就在最近，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行动。”⁸

西安事变前，学兵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成为抗日骨干。

张学良为培养干部，加速东北军的政治改造工作，还坚决主张将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非迁来西安不可。东北中学（时在河南鸡公山）将来也得迁来。他说，蒋介石有中央军校，我们有什么？要想抗日，首先须改造东北军；要改造东北军，首先要培训基层军政干部。师长以上的可暂时不动，团以下的要逐渐更换。东大同学基本可当营、连级干部，东北中学同学可当班、排长。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全军，领导抗战。

当时，东北大学学生强烈反对比较守旧的王卓然（以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张学良开始不想换王，因王卓然对他有恩。苗剑秋便在张面前力争，栗又文劝张说：“你可以给他些钱，让他生活得好些，就是报恩。但大学是国家的公器，既然学生们反对，你就不能以私害公。”张学良这才同意，由周鲸文出任代理东北大学秘书长，决定东大工学院先迁西安。同年7月，张学良为东北大学1936届毕业同学录题词：“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8月，张学良以15万元私款在西安城外西南角兴建东北大学西安校舍，并在奠基石上亲笔题词：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至九一八，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勛尔多士，复我河山！

9月30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举行秋季开学典礼。张学良亲临会场，对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和学生200余人讲了话，要点为：（一）读书不忘救国，救亡不忘读书；（二）养成无畏之奋斗精神；（三）做西北青年之表率；（四）教职员和学生间要开诚合作。⁹他对东大学生寄予厚望。

在通过各种途径全力培养抗日干部的同时，张学良从1936年秋天开始，在东北军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更，以改造东北军，适应新形势。如第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被免职，任命赵毅接替；第一一五师师长贺奎调到第一〇九师任师长，刘启文升任第一一五师师长；卫队第二营营长周文章改任西北“剿总”第三处（总务处）上校副处长，空缺由孙铭九接替；应德田接替孙铭

九,负责随从参谋秘书室;第一〇五师团副康鸿泰调任学兵队队长,西安事变前夕又调任第一〇五师团长。张学良原拟调第一一六师师长缪澂流为副师长,经王以哲力保,改任第五十七军军长。原拟任吕正操为第一一六师师长,因缪澂流反对,并力保刘元勋,乃任刘元勋为第一一六师师长;欲任第一〇五师团副王甲昌为团长,因师长刘多荃反对而作罢。这些人事变动,基本上是朝着联共抗日方面发展,但仍保留了许多反动、保守和不得力的军政干部,而且因东北军积习太深,动手太晚,未及完成整顿、建立起坚固的联共抗日阵线,西安事变即仓促爆发,以致张学良被扣南京后东北军内部不一,无力救援,甚至发生分裂的严重后果。¹⁰

寻求国内外盟友

为在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张学良在继续巩固与杨虎城、中共的“三位一体”同时,还努力加强与国内外各方面的联系。在国外方面,他一直想谋求与苏联建立关系,获取苏联的物质和军事援助。他说:“过去蒋介石北伐,靠苏联派两条船运来军火;冯玉祥五原誓师,靠苏联派 200 辆汽车运来军火;我要打日本,也得取得苏联的外援。”¹¹

从 1934 年开始,他就通过李杜经欧洲前往苏联之计划,希望达成目的,但没有结果。

1936 年 5 月 12 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第二次会谈,决定东北军给西征的红军让路,并配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以利打通国际路线。张学良同意为中共代表邓发经过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提供帮助。双方对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家在西北实行大联合的“西北发动大计”交换了意见。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具体协议。¹²

6 月 10 日,张学良驾驶飞机离开西安前往兰州,亲自为邓发赴苏联办理手续,同时给新疆的盛世才写信发报,对联苏给予极大的期待。

1936 年 7 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此期间,经过焦绩华介绍,在南京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雷平中将见面,谈到了抗日问题,张学良表现出强烈的愿望。8 月,张学良又在上海法租界公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第二天,张学良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回访鲍格莫洛夫。张学良在谈话中以急切的心情向苏联大使提出了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的重大问题。张学良表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联大使回答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言下之意,苏联的援助要以中国能否停止内

战,国共合作为前提。在归途中,张学良问焦绩华:苏大使的答复是什么意思?焦绩华回答:“大概是和停止打内战有关。”张学良叹息说:“中央用得着你的时候,则言听计从,用不着你了,则把你一脚踢开,对外可不行啦!”¹³

在本章前节所述张学良向刘鼎透露他“不小的计划”中,曾考虑到1936年11月反蒋抗日,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认为届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即指望到那时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张学良要与蒋介石决裂,是不太可能的。¹⁴

因此,1936年8月,张又派西北“剿总”秘书栗又文、第一〇五师第一旅旅长董彦平前往新疆,联络盛世才,打通国际路线。9月下旬,他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会见了盛世才军中的苏联教官安德列夫,说明了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不久,安德列夫答复:已经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表示可以在甘肃平凉援建一个兵工厂,联苏工作初见成效。

在国内方面,张学良积极联络西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谋求建立联共逼蒋抗日的统一战线。1936年5月,张学良飞赴太原,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必须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等密告阎锡山,争取支持。阎锡山迫于红军东征的压力,表示同意,并愿与张配合,共同行动。10月,张学良又赴太原,与阎锡山商定,吁请蒋介石联共抗日。如蒋不同意,则晋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杨虎城认为是逼蒋抗日的大好时机,与张学良商量援助两广问题。他们决定分别致电蒋介石,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事的主张。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逼蒋抗日。¹⁵同时,张学良派中校秘书刘启戈前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系。不久,余汉谋逼陈济棠下野。张学良又派中校参谋解如川去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希望联合抗日。此时,张学良还派代表到北平、济南、成都,分别向宋哲元、韩复榘、刘湘等地方实力派提出逼蒋抗日主张,获得不同程度的响应。这样,从华北经西北,到四川、广西,一条逼蒋抗日的战线已初露端倪。

抗日舆论准备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1936年9月18日,旅陕东北民众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发表了宣言、通电、《上国民政府请缨书》和《上张副司令请愿书》,一致要求南京政府早日实行抗日,收复失地。会后,举行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行至西北“剿总”时，向张学良递交了请愿书。书中写道：

我们要求副司令的，是不要再信什么“调查”、“亲善”的辞令了，因为那是戏法式的骗局，我们指望它，永远不会有回家之日；也不要再作“待机”、“等待”的念头了，等到那天，侵略者也不会善罢甘休地交还东北，反而只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地铸成积重难返的错误；也不要再相信“三日亡国”、“十日亡国”的滥调了，“事实胜于雄辩”，拿淞沪之战、长城之战的铁证，敌人并不是多么可怕的。我们拼着我们的血肉头颅，一定可以达成回家之愿。……期望副司令领导我们，早日踏上杀敌的战场，完成历史的使命，胜则披甲还乡，败则亦愿效田横五百的义死。我们的心已坚如铁石，我们的血已沸腾到顶点，愿以我们数十万颗的肉弹作副司令的武器！

张学良身着戎装出来接见，在“请张副司令领导抗日”的口号声中，收下了请愿书，并当场致词，称赞大家的爱国热情，表示一定要率领东北军抗战复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月3日，张学良在西安接见了经常给伦敦《每日先驱报》撰稿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并邀请南京中央记者参加。他在回答斯诺夫人提问时，明确表示：“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均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然后惟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¹⁶这是张学良到西安后，第一次通过报纸向世人公开自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以攘外求统一的主张。

10月10日，中华民国25周年国庆日，张学良特发表纪念文章，严正指出：

在现阶段，国难严重的程度，实在是无以复加了！整个民族的生命眼看就要完了！假如还有人以为不要紧，不在乎，那正像有人说：“中国再这样忍受下去的结果，就等于胡匪于正法之前，喊说再等二十多年，我还是这大的好汉子一样！”国难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当然必须马上起来解除它！